

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

——评“非意识形态化”理论

万 顺 福

意识形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的泛滥成灾，是我国长期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性、严峻性和复杂性的必然恶果。而这种状况的存在，同“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正确把握意识形态范畴，分析和批判“非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观点，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非意识形态化”理论，是五、六十年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所谓试图以“纯科学的”“客观的”理想代替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个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阿隆首先提出，集大成者是美国的社会学家贝尔和利普塞特。他们于1960年相继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和《政治的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对“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作了全面的论述。阿隆认为：意识形态从外部已经失去了对舆论的影响，它与群众的“非政治化”相适应，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束，人们在思想上日益趋向一致。贝尔和利普塞特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空想出来的意识形式，正在消亡，趋于没落，永恒的科学技术的价值观代替了陈腐的、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正在导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的消失。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现代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已经没有必要对重大事件作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意识形态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已经或者接近完结，社会生活已经非意识形态化。

显然，“非意识形态化”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经济基础的自觉反映，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是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的分裂也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分裂，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在阶级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往往有三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首先是反映这个社会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消灭的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复辟旧社会制

度制造舆论；再次是反映现存社会制度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诸因素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呼喊。在这三种意识形态中，反映和维护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治地位。但是，同一社会形态中存在着的几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这是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意识形态一般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虽然，社会意识中确实有非意识形态的方面，特别是其中的自然科学，对社会变化包括人们的某些观念发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离开现代科学技术来谈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社会结构中不同利益以至世界观、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则不取决于科学技术，而是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只要客观存在着维护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一定有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都是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列宁说：“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和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③毛泽东同志也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④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史已反复证明，反映不同经济基础，体现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度的地主阶级思想。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都是地主阶级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但是，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封建统治，同地主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中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的口号，都是直指封建专制制度的。当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社会的发展。但是，无论是革命阶级还是反动阶级，都非常重视用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无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和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凝聚作用和激励作用，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国家，存在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就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生活就不可能“非意识形态化”。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军事领域，而且更重要地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国际范围看，

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在用军事、经济等手段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失败后，主要采用“和平演变”的手段，妄图从根本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国内，近年来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散布的种种谬论，说到底，就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近几年来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得相当尖锐。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社会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否认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淡化意识形态工作，宣扬意识形态多元论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偏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犯过“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整体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就已经从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激化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以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但是，我们在批判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却犯了相反的错误。许多人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甚至根本忘记了在我国现阶段仍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个事实。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阶级分析方法，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因此，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一些人毫无思想戒备，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并把自由化的鼓吹者们吹捧为民族精英，使各种错误观点畅行无阻，危害至深。

其二，崇洋媚外，对西方资本主义丧失了警惕性。随着对外开放的进行，一些人好象发现了新大陆，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不行，外国的一切都好。特别是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更是对社会主义大加批判，说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四十年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而对资本主义则赞不绝口，认为中国要富强起码还要作三百年殖民地，甚至乞求美国总统干预中国内政，把中国引向“自由世界”，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一些人忘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区别，以为西方资本家及其政府也会真正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看不到他们时时刻刻企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狼子野心。

第三，放松了对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放松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没有始终一贯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八十年代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尤其是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

八十年代的几年中，我们思想战线都显得软弱涣散，一些人竭力否认列宁多次强调的“灌输”原则，反对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批判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用智育来冲击德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下来，一些人甚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别，不应该上升到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涌入我国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防御和抵抗能力。与我们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始终保持着一种进攻态势，它们非常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美国一些政治家就明确表示，对中国的留学人员，要把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看作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任务。以至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嘲笑、讥讽，散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竟畅行无阻的奇怪现象。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乎在拨乱反正，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确宝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党内和社会上有一些人从右的立场出发，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人们对空洞政治说教的厌恶和对“左”的错误的憎恨，打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幌子，以学术研究为名，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成灾。尽管邓小平同志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直到发生198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前，反自由化的斗争都显得软弱无力，使自由化思潮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酿成了那场触目惊心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把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推向颠覆的边缘。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三)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以及在我国泛滥一时的“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排斥和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这些论调企图用“技术统治论”、“趋同论”以及各种不同性质意识形态应当“和平共处”来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妄图以此瓦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志，解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追求。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法宝，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具有超前的导向作用；它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能够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使全国人民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被群众掌握后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已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

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宣扬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论者并非真正要“淡化意识形态”，他们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同时又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就在“非意识形态化”论调提出不久，在西方就出现了“再生意识形态论”，不少资产阶级思想深深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西方国家在“遭受到一种用武力无法挽救的失败”之后，制订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向无产阶级展开“思想战争”，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早在1950年，杜勒斯在其《战争或和平》一书中就充分肯定美国之音这“美国的蜜语”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1960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说：“我们应该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做广泛的接触”，“将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灌输到他们的人民中去，这样最的目的在于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最后变质”。1961年，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思想战、心理作战”必须调动国内国际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⑤尼克松更是言不讳，他认为，“归根到底，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当深知世界如何运转的政治家们以强大的思想为武器时，更是如此。”^⑥里根在1982年出访英国时，在英国议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西方实行一项长远计划：“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从以上简单的引证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他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非常强烈的。几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按照以上既定方针向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猛烈地进攻。当东欧国家由于诸种复杂原因出现政局不稳、经济发展受挫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兴奋不已，大力支持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但前提是要这些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不仅如此，西方资产阶级还拼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言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在国内的代表。他们大肆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否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大公无私精神。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文艺观点，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如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抽象的人道主义等，妄图从根本上搞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恶目的。所有这一切，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主张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否定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主张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和计划经济；思想上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一句话无论是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还是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

综上所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各种学说和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必须十

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及其他错误思潮，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它对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起着指导、维护和促进的作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任务。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此，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可能偏离方向，甚至有蜕化变质的危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七中全会，反复强调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这一点，他说：“在我们工作遇到困难，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这对我们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切实地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②

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我们必须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对全党同志、全国人民进行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我们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注 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602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384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736页。

⑤《当代思潮》，1991年第1期。

⑥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333页。

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3-124页。

⑧《求是》1991年第12期。